普惠金融深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时代内涵、现实逻辑与路径创新*

王小华，王新秀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实现跨越式突破，在服务城乡和支持实体经济领域成效显著。当前，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深化，传统普惠金融已难适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向数智化、多元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成为必然。但在农村深化普惠金融进程中仍面临多重约束：一是金融服务的功能认知偏差与供给不足，部分主体忽视普惠金融综合服务价值；二是信息共享滞缓与农村信用体系短板，制约风险评估；三是金融产品与农户需求适配性差，难以有效对接差异化诉求；四是农民数字素养与资本积累滞后，影响数字金融服务渗透；五是风险共担机制不完善、抵押物缺乏，削弱融资可得性；六是区域发展失衡，偏远地区服务存在空白。为此，需通过多维度发力，深化普惠金融内涵认知，系统总结金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经验；强化金融机构支农担当，健全多元金融互补机制；创新绿色普惠模式，引导资源流向乡村绿色产业；搭建开放型数智金融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与制度，为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不竭动力，助力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同频推进。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村金融；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6)01-0066-17

一、引 言

农业强则国家强，乡村兴则民族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1]，其推进成效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质量。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振兴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4年强调“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进一步明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6年对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部署。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推进乡村振兴表述的演进，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已从循序渐进的布局阶段，稳步迈向提速攻坚的纵深推进阶段，为农业强国建设锚定了核心方向。作为关乎经济、社会与政治多维度的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的深度推进不仅催生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金融服务需求，还将为金融服务农村实体经济创造历史机遇，同时也对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赋予了新使命、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新方向[2]。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正是破解“三农”领域金融排斥、实现金融资源下沉的关键路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普惠金融”列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五篇大文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JY014)。

作者简介：王小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与普惠金融。

章”之一，确立了其在国家金融战略布局中的核心地位。2025年3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更加有力的目标，既直面“三农”金融服务的现实痛点，又契合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协同需求，为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顶层设计指引。从实践演进来看，我国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农村金融机构覆盖面稳步扩大，农信机构为农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农村信用体系与保险体系协同完善，有效缓解了农村中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群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3]。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全国建成涉农信用信息系统118个，评定信用户1.24亿个、信用村32.28万个、信用乡（镇）1.46万个①。数据充分印证了我国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也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随着国家战略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全面振兴”，普惠金融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从供给侧来看，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仍存在多维度短板：财政资金、金融资金与社会资本的协同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资金配置效率有待提升[4]；农信机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覆盖不均衡，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可得性仍有差距；农业科技贷款占比持续下降，信贷产品设计同质化严重，难以适配农业生产季节性、周期性及产业升级的差异化需求[5]。从需求侧来看，普惠金融目标群体的适配性问题同样突出：一方面多数农民群体的金融素养与数字技能运用不足，存在自我“金融排斥”现象；另一方面农村不同收入层级、不同产业类型农户的金融需求异质性特征日益显现，现有标准化服务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此外，涉农经济主体具有数量大、分布广、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特殊性，增加了对普惠金融服务的精准性需求与可持续性难度。

在此背景下，亟须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回应三大核心问题：乡村全面振兴提速攻坚阶段，普惠金融的时代内涵与核心功能发生了何种新变化？供需两侧结构性矛盾的形成机理与关键症结何在？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服务优化，构建适配乡村振兴需求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农村金融理论体系，还能有效探索这一特色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普惠效能，更能为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强化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力度提供实践参考，对推动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协同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普惠金融概念再认识

现有关于普惠金融的表述多聚焦于基本概念层面，内涵解读尚显不足。本文将在对普惠金融基本概念展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普惠金融内涵。

（一）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

如何理解普惠金融？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与关注重点存在差异，国内外学界对普惠金融内涵的解读与深化也各有侧重（见表1）。具体而言，“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②。由此看来，普惠金融并非单一的金融业务形态、特定的金融机构类型或具体的金融产品类别，而是一个层次分明、要素完备的金融生态系统。宏观层面，它包含支撑普惠金融运行的金融法律体系、政策框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511号建议的答复》，参见https://camlmac.pbc.gov.cn/zhengwugongkai/4081330/4081344/4081419/4081727/20250808190600274 90/index.html。

② 资料来源：*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 Widening Access, Enhancing Growth, Alleviating Poverty*，参见https://docslib.org/doc/1071269/building-inclusive-financial-sectors-for-development-widening-access-enhancing-growth-alleviating-poverty。

架与监管制度；中观层面，它涉及保障普惠金融落地的金融基础设施、产业组织及其配套机制；微观层面，它囊括参与普惠金融实践的金融机构主体、差异化金融产品及创新经营模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即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③。传统普惠金融主要强调金融服务的“普”与“惠”，即扩大覆盖面和降低服务成本，但面临地域限制、信息不对称、获客成本高、风险控制难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则弥补了传统普惠金融的短板，依赖金融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突破物理网点和人工成本束缚，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不断推动金融服务门槛下移，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受众范围，解决长尾群体缺乏金融服务的困境[6-7]。纵观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已从基础服务供给逐渐升级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创新。

表1 关于普惠金融的理解

层面	作者	时间	对普惠金融的解读
概念层面	杜晓山	2007	普惠性金融体系体现的实质是信贷的机会公平，金融融资渠道享用权的公平问题[8]
	汪亚楠等	2020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结合体[9]
	冯兴元等	2021	数字普惠金融是所有人口，尤其是被正规金融部门排斥或服务不足的人口，通过数字方式获得和利用的各种金融服务[10]
理念层面	杜晓山	2007	使弱势农村和弱势农民都能通过金融途径来提高收入水平，遏制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8]
	李建军等	2020	普惠金融可以分为广泛的包容性、特定化配比程度和商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11]
	王义中等	2024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助力共同富裕[12]
	张龙耀等	2025	普惠金融是益贫式增长理念在金融层面的体现[13]
创新层面	Moenninghoff and Wieandt	2013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成本低、速度快[14]
	Berg et al.	2020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金融普惠性并减少不公平现象[15]
	郭峰等	2020	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普惠金融的重要源动力和增长点[16]
	许月丽等	2022	相比传统农村金融，数字普惠可以触达传统农村金融没有涉及的领域，二者呈现有效互补关系[17]
	王小华等	2024	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为提升金融普惠性带来新的希望[7]
责任层面	星焱	2015	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对于实现普惠金融至关重要[18]
	何德旭和苗文龙	2015	解决金融排斥、提高金融包容[19]
	周利等	2021	作为普惠金融体系中重要构成的微型金融机构可能存在脱离低收入群体的使命漂移现象[20]
对象层面	Choudhury	2014	普惠金融提高了家庭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率，提高了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水平，降低了家庭贫困脆弱性[21]
	朱一鸣和王伟	2017	收入较高的农村居民相较于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更多[22]
	Ozili	2018	普惠金融为所有人，尤其是穷人，提供获取和转移资金、增加资本和降低风险的机会[23]

如表1所示，从概念、理念、创新、责任到对象的五个维度来看，普惠金融在基础覆盖阶段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概念层面，侧重于公平性与可得性；理念层面，强调包容性，且与国家政策关系密切；创新层面，强调数字技术的探索与使用；责任层面，政府的政策引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象层面，强调覆盖群体范围的全面性。不可否认，在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覆盖阶段，上述特征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有的金融资源配置范式与服务赋能逻辑，基础覆盖阶段的普惠金融逻辑并不能自然延续至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的新征程，继续依

③ 资料来源：《二十国集团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参见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142307/2016091419074418496.pdf。

赖反而会限制普惠金融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赋能。在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背景下，提高普惠金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能力，必然要求其自身实现“质”的跨越式发展。随着普惠金融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其内涵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金融的“普”与“惠”这一基础层面，更向质量有保障、需求能适配、发展可持续实现了进阶升级。在此背景下，亟须以更全面、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并锚定新时期普惠金融的定位与内涵。

（二）普惠金融的新时代内涵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普惠金融的目标聚焦于“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为普惠金融的基础覆盖阶段指明了发展道路。2023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此基础上首次明确“建成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并将普惠金融发展目标从泛化可得转向“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可得性提升”，这标志着普惠金融进入了质效提升的新发展时代。

上述政策转变聚焦普惠金融自身的体系化建设，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全局框架中，并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大文章”的定位意味着普惠金融不再是孤立的金融服务领域，而是国家整体金融战略的核心支点，需在“五篇大文章”的联动中实现更高维度的价值。2025年《指导意见》出台，以制度性文件的形式巩固了普惠金融的战略定位。其导语部分明确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正文中“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水平，支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表述，与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中“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一脉相承。普惠金融正从单一内涵的民生服务工具，升级为服务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的战略型金融力量，承担着更为复杂且重要的国家发展使命。

在此过程中，普惠金融的内涵实现了多维度的深刻演变。概念层面，普惠金融从基础服务工具转变为金融基础设施，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核心载体。理念层面，普惠金融从侧重包容性转变为侧重战略性，深度嵌入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建设、共同富裕等顶层发展目标。创新层面，普惠金融正从简单的技术探索迈向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场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复杂技术创新，既通过科技手段突破传统金融服务边界，又依托监管手段筑牢风险防控底线，推动金融业内部竞争，倒逼服务效率优化，最终反哺经济增长。责任层面，普惠金融将从自身单维发力转向各方共同发力，从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到政府、金融机构、社会资本的多元主体协同，构建起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共促发展的金融格局。有研究表明，相较于纯市场机制或单一行政干预，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金融服务协同创新可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有效突破效率与公平两难选择困境[24]。对象层面，普惠金融对长尾群体的帮扶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既保障传统弱势群体的基础金融需求，更让金融资源更高效地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市民等国家战略重点群体。这种全方位的内涵升级，标志着普惠金融正从金融领域的局部实践，成长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金融力量。

新时代普惠金融发展已超越传统贫困帮扶的范畴，成为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柱，更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核心支撑。做好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工作，需以数智化转型为核心引擎与底层支撑，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系统推进。一方面，立足金融强国战略目标，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数智技术，深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有序优化金融监管效能，不断拓宽金融服务的触达边界，为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筑牢制度与体系根基。另一方面，围绕农业强国战略部署，借由数智化转型突破传统农业金融服务瓶颈，聚焦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需求，通过金融创新精准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有效覆盖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乡村经济主体，补齐农业领域普惠金融服务短板。同时，依托数智化平台构建市场、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机制，

打通金融资源流向乡村生产经营一线的“最后一公里”，提升普惠金融在农民福利水平提升、农业生产提质、乡村产业融合、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服务质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在城乡、区域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推动均衡发展、绿色发展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效能叠加，最终让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普惠金融中的“普惠”逻辑转换

认识普惠金融的本质内涵，不能局限在解决金融排斥的层面，必须从普惠金融的最终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中加以挖掘。早期普惠金融的核心诉求是破解金融排斥，让农户、小微企业等长尾群体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有力填补了金融服务体系的空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难以代表真正的普惠。部分群体即便拿到贷款，也可能因缺乏生产技术、市场信息或风险管控能力，再次陷入亏损负债的困境，难以通过金融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状态。对此，《指导意见》提出“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融资可得性和金融产品服务供需适配度持续提升”的目标要求，并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发挥协同作用的组织安排夯实现实基础，为不同群体提供融资融智的专业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普惠”不仅关心长尾群体有没有获得金融服务，更关心其能不能用得好金融资源，即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对建设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可以看出，普惠金融正从简单的扶贫济困转向对重点主体的精准对接与专业服务，通过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与精准赋能，推动中小微企业、新市民等群体深度参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使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从“输血”转向“造血”，实现全民共享的经济增长。因此，普惠金融的“普惠”不只是金融普及，更是包容性增长的金融赋能，是个体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共振，是公平正义与商业可持续的统一。

这一转变也可从其历史语境与价值内核中加以解读。从历史发展来看，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并非单纯为了填补金融服务的空白，而是源于21世纪初全球发展失衡背景下，对“千年发展目标”和“包容性增长”现实需求的产物。这意味着普惠金融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公平正义的特质，决定了其不只满足于“机会均等”的初级目标，更要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长远目标。从价值内核来看，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与重点关注对象具有一致性[18]，它真正关注的不是单纯让更多人获得金融服务，而是金融服务能否帮助弱势群体融入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其依托生产经营提升收入、改善生活，最终缩小贫富差距。所以，“普惠”的核心在于通过金融的普及，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不只有少数强势主体能够享受，而是让所有群体机会平等地参与、公平地分享，实现经济增长的普遍惠及这一深层目标。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金融服务转变，也说明普惠金融更深层的内涵是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金融创新。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以宗旨为导向，而非手段导向。其“普惠”的核心不在于金融服务的普遍惠及，而在于通过金融撬动经济增长成果的普遍惠及。无论是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传统机构，还是金融科技公司等新兴主体，只有既守住“普惠”初心，又遵循市场运作规律、实现商业可持续，才能真正被纳入普惠金融的范畴。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历程中，既出现过行政命令式的放贷，导致大量坏账、金融机构退出、脱离普惠本质，也出现过民间高利贷，导致农户负担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因此，应该认识到，若只注重普惠性，普惠金融的实践会缺乏落地能力；若只注重金融性，则使普惠金融悖离了普惠的本质。由此可见，理解普惠金融的关键在“普惠”，要实现普惠金融的关键在“金融”，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为共同富裕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支持。

（四）普惠金融中的“金融”逻辑转换

普惠金融是具有普惠特征的金融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已从总量短缺转向结构失衡，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仍存在空白，遵循传统商业逻辑的普通金融难以衍生出适配

普惠属性的金融形态，必须随着金融供需的变化对金融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基本概念上，普通金融主要强调金融体系的整体发展和金融总量的扩大；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使社会各阶层均以合理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务[11]。运作理念上，普通金融遵循效率优先的市场化逻辑，金融资源大多向高净值群体集中，旨在实现利润最大化；普惠金融兼顾公平与效率，通过政策引导、社会参与、数字技术创新等手段，让资源向长尾群体倾斜，在商业可持续发展下，为更多人群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金融创新上，普通金融侧重产品复杂度与市场规模方面的创新；普惠金融侧重降低成本与风险控制方面的创新。责任边界上，普通金融主要对股东和投资者负责，通过服务大企业、高净值群体支撑实体经济增长；普惠金融既要通过商业可持续性保障自身运营，又要承担金融公平、减贫增收的社会使命。服务对象上，普通金融的服务对象具有更高商业价值，能够更快汇集闲散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普惠金融聚焦被普通金融排斥的群体，这类群体往往缺乏传统抵押物、信用数据薄弱，但存在广泛的生产生活金融需求。由此可见，普通“金融”与普惠“金融”虽内核相通，都基于市场运行规律，但功能侧重与价值导向不同。普通金融更强调利润与效率，存在金融排斥；普惠金融更强调机会平等，以不违反金融规律为前提、以风险可控为原则的金融公平，是消除了金融排斥后的金融[11,19]。

“普惠”是普惠金融的目标与本质特征，“金融”是实现该目标的核心落脚点，唯有依托金融手段，“普惠”的价值才能真正落地。《指导意见》将普惠金融纳入金融强国与农业强国建设框架，在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明确指出发挥金融市场核心功能，培育循环互动的金融市场机制，发行各类特色金融产品，为“三农”等领域提供多层次资本支撑；另一方面要求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精准度与效率，同时强化相应风险管理，实现创新与安全的平衡，还将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深度融合，共同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可以看出，普惠金融中的“金融”正在从过去乡村振兴中单一的政策补贴向多元的市场化生态转型。但要实现这一市场化转型与战略协同，需先破除对普惠金融的认知偏差。

目前，国内普遍将“inclusive financial”这一名词翻译为“普惠金融”，易引致两方面误解：一方面，会误导人们以财政思维看待金融，自然地认为金融就应该普惠，于是将普惠金融活动与财政行为混为一谈，忽略了普惠金融固有的商业本质；另一方面，易让人们误以为金融体系是“嫌贫爱富”的，是在金融资源满足高净值群体的金融需求后，才逐步将服务重心延伸至长尾群体[25]。上述对普惠金融的错误认识，既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也会影响普惠金融的包容性。

相比普通金融，普惠金融在平衡支农支小的社会价值与商业可持续经济价值过程中，需要克服长尾群体天然存在成本高、风险大的特性，这意味着仅依靠普通金融的传统运作逻辑远远不够。在普通金融的基础上，普惠金融还需以信心、信念与信仰来填补传统金融在服务普惠对象时的内生动力缺口。首先，信心是普惠金融的支撑。研究表明，信心带来的乘数效应会放大经济的波动。普惠金融通过为农户、中小微企业等长尾群体提供发展资源，增强其经济参与底气，促进经济向好循环。其次，信念是普惠金融的标志。金融机构服务长尾群体时普遍面临成本高、风险高、盈利空间窄甚至亏损的局面，倘若仅依赖传统商业逻辑，难以支撑其对普惠金融业务的持续投入。此时，对普惠金融长期价值的坚定认同，能为金融机构突破短期经营压力、抵御收益不足提供支撑，推动其主动承担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责任。最后，信仰是普惠金融的力量，其本质是对金融公平的追求。每个人都有金融权利，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而不是被出身、财富、地域等先天或外在条件所限制。依靠这种信仰，普惠金融可以打破普通金融既有格局，更高效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实现金融服务对各类需求主体的全面覆盖。

普惠金融的“金融”承载时代使命，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可以说，普惠金融本质是金融供给方与需求方在制度框架约束下，通过金融手段和普惠理念，共同支撑资源运作，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统一，进而完成价值实现的普惠性信用交易制度化成果。普惠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的选择性服务逻辑，利用自身包容性重新定义了金融的社会价值和服务边界，既守护普通人的生存底线，也点燃其获取更多发展机会的希望，这正是普惠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典型问题与事实逻辑

为全面把握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现状、回应强国建设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更高要求，本文使用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调查（China Rural Economy and Rural Finance Survey，简称“CRERFS”）④数据进行分析。CRERFS是由农业农村部委托西南大学组织实施的系列微观数据库，聚焦农村发展现状、农业生产难题及农户政策需求等核心议题，旨在为乡村振兴战略制定提供微观农户数据支撑。该数据库已形成2021、2023、2024三个年度的调研数据，各年度调查范围覆盖地区不同：2021年聚焦重庆、湖南、云南、四川、贵州五地；2023年聚焦山东、河南、四川、重庆；2024年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地区。数据涵盖家庭成员基本特征、家庭生产经营、收入与消费、资产与负债、数字素养与数字金融等多维度信息。调查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服务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一）金融功能认识与服务不充分

政策领域将金融窄化为融资工具的认知误区，既忽视其社会系统润滑剂与生态治理杠杆的价值，也片面化了乡村现实金融需求，易使普惠金融陷入形式主义[25]，这一问题在乡村金融服务实践中得到印证。王小华等[2]指出，现有研究并未跳出金融的传统“融资”思维框架，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多局限于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方面的融资支持，难以满足乡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多元需求，同时直接融资及保险、担保等类型金融服务发展滞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履行不充分，严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CRERFS 2024数据表明，农户对大病医疗、子女教育、购买（修建）房产、购买汽车等生活性融资需求占比达到61.89%，而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以及农家乐经营等产业发展类融资占比分散，其中农业生产占14.85%，农产品加工仅占0.49%，农家乐经营仅占1.49%，电商销售仅占0.49%，产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尚未形成集中有效覆盖（见图1）；从融资渠道来看，农户的融资需求高度依赖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也大量依赖亲朋好友等非正规渠道的直接融资，正规直接融资服务发展滞后（见图2）。这种金融服务不充分的现状，折射出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在认知层面仍存在明显短板。

（二）信息共享低效与信用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但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来看，信息资源不足和征信数据体系不完善，仍然是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拦路虎[2]。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困境看，CRERFS 2021、2023、2024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其被金融机构按企业对待，但大多缺乏相应的财务报表和现金流信息，融资困境突出：78.3%存在资金短缺问题，38.6%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贷数量配给不足，41.2%将资金短缺视为发展中的最大难题。信用信息的缺失，正是农村资金需求迫切却难以得到满足的关键原因之一。从乡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层矛盾看，当前乡村信用体系看似完善，实则存在建设短板。CRERFS 2024数据进一步表明，尽管60%的村被评定为信用村，但信用村的信用户占比只有47.42%；尽管金融机构对80%的村进行整村授信，但户均授信额度仅为4.95万元。以上数据表明，信用村虽在各地广泛推进，但信用户占比低，多数农户仍被排斥在信用贷款体系外；整村授信虽实现流程化推进，但户均授信额度不高，融资金额难以支撑当地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能力较弱。

④ 在未经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后文有关调查显示的数据均来源于该数据库。因不同调查年份的问题及区域选择存在差异，故后文中关于数据的运用有所不同，并非都是根据2021、2023、2024三个年度的所有调研数据分析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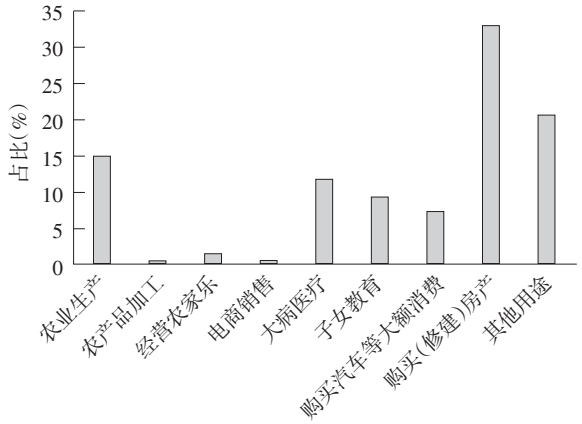

图1　农户贷款用途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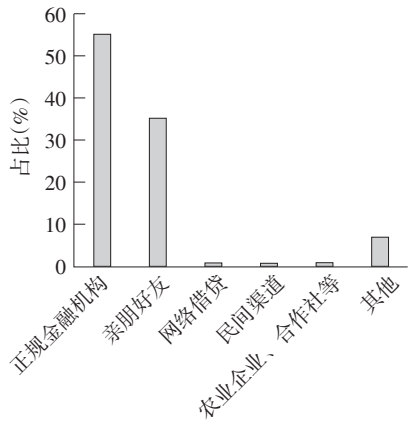

图2　农户融资渠道情况

（三）金融产品供需适配不足

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化、复杂化要求金融机构通过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提供精准服务，金融机构未能以市场为导向设计匹配的产品与服务，导致金融产品供需适配性严重不足。从金融产品的供给结构看，CRERFS 2021、2023、2024调查数据显示，80%以上的乡村从业主体仍通过传统信贷业务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差异化的金融需求并未得到有效满足，数字借贷、数字理财、数字保险参与度极低，金融产品的供需不适配。从农户的数字金融使用能力看，CRERFS 2024调查结果显示，尽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多数农户具备一定数字素养，但每周使用4次以上数字支付的农户占比不足八成，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户尚未熟练掌握这一能力，4.4%的农户几乎不使用数字支付，尚未融入数字金融服务体系。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技术降低了服务获取门槛，但对长尾群体金融知识与能力的要求却更加严苛，长尾群体的数字素养与金融素养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的关键因素。在推进数字金融服务的制约因素中，认为自身年龄过高、缺乏资金、缺乏技能构成最主要的三大障碍（见表2），这也印证了数字素养与资源约束对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限制。

表2　农户数字化的主要障碍

	缺乏资金	缺乏设备	缺乏技能	缺乏培训	害怕风险	年龄过高	其他
占比	29.67%	1.89%	19.21%	7.20%	7.38%	30.53%	4.12%

（四）农民数字资本积累不足

数字资本的核心在于调动资源以创造价值的潜力[26]。Ragnedda[27]将数字资本定义为“内化的能力和技能”（数字能力）以及“外化资源”（数字技术）。对农户而言，其数字资本体现为通过接触、运用数字技术，逐步积累生产生活所需技能与资源，并转化为数字经济参与以增加收入的能力。本文利用CRERFS 2024调研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能运用和数字经济参与三个维度构建数字资本指标体系，评估农户数字资本。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农村金融服务站建设滞后、乡村数字金融人才短缺，农户的数字资本积累、技能运用及经济参与程度整体较低，对于数字技术、数字金融、智慧农业易存在认知偏差，数字经济参与度严重不足。从不同农户之间的差距来看，农户在数字经济参与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最高，基尼系数为0.648（见表3），说明农户利用数字技术创造财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布极不均匀，只有少数家庭具备较高的数字经济参与能力，数字资本的不平等正从基础层面的数字接入向更高层次的数字经济参与转变。

表3 农户基尼系数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技能运用	数字经济参与	数字资本
基尼系数	0.396	0.382	0.648	0.364

（五）农户金融参与和风险保障不足

当前农村金融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CRERFS 2024数据表明农户在金融参与度和风险保障覆盖上存在多重短板。农业保险方面，保险覆盖率极低，仅16.53%的农户购买了农业保险，超八成农户处于无农业保险保障状态。借贷担保方面，获得贷款的农户中，无担保农户占比高达99.08%，且有30.91%的农户未在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担保工具在农户借贷中几乎未发挥作用，正规金融对农村群体的触达与渗透仍有短板。供应链融资方面，尽管个别农户参与订单融资、仓单质押融资与存货质押融资等模式，但高达99.68%的农户未参与供应链融资，供应链金融工具对农户的覆盖和赋能严重不足。整体来看，当前农村金融体系中，帮助农户对接融资、分散风险的工具尚未形成有效覆盖，农户仍处于融资困难、风险自担状态。

（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区域不平衡

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格局中，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态势。东部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以及领先的数字化水平，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西部地区尽管资源丰富，但受限于经济基础薄弱、地理环境复杂等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迟缓，与东部地区有一定差距[28]。根据蚂蚁开放研究实验室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⑤，2023年排名第一的上海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高达473.83，而排名最后的青海仅351.08，两者相差超122个指数点。其中，上海依托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达到466.54，使用深度达到485.42，青海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仅357.56，使用深度指数仅302.25。尽管近几年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有所发展，但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排名前五的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排名后五的均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亟待缓解，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运行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普惠金融创新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来自重庆的经验

长期以来，重庆市持续强化农业农村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的金融支持，不断探索并深化具有巴渝特色的普惠金融实践路径，深度赋能乡村产业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农文旅融合发展等领域，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全国普惠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兼具地区特征与借鉴价值的经验。这一实践成果的背后是重庆基于完整逻辑框架推进普惠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谋划。

概念层面，重庆建设的普惠金融是立足巴渝乡村产业实际，以科技赋能与特色产业为核心，覆盖农业全产业链、农村全场景、农民全生命周期，兼具广度与深度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指导金融资源的科学配置，破解乡村振兴中“融资难、融资贵”痛点，助推农业现代化转型与农村产业质效升级。截至2025年4月末，全市建成金融服务港湾564个，覆盖全市所有区县，依托金融服务港湾累计走访对接经营主体47万户，投放贷款逾3 500亿元，开展政策宣传2.8万余次，覆盖人数超54万人次⑥。

理念层面，重庆深刻把握普惠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问题导向，探索构建多层次、广覆

⑤ 数据来源：《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参见https: //www.deor.org.cn/research/numberdata#hotChart。

⑥ 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聚焦“321”工作思路 打造普惠金融新模式》，参见http://chongqing.pbc.gov.cn/chongqing/107665/5737555/index.html。

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打造兼具政策导向与市场活力的重庆特色普惠金融新模式，为长尾群体提供兼具公平性与可得性的金融保障。截至2024年11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超6 100亿元，是2019年末的2.6倍；全市涉农贷款余额近8 000亿元，是2019年末的1.4倍⑦，彰显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创新层面，重庆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优化服务模式，既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持续拓宽服务覆盖边界，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动力。例如，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创新推出“裕农快贷—信易贷”线上产品，通过对接柑橘、榨菜、花椒等涉农大数据平台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农户信贷资金“精准滴灌”，支持全市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截至2025年9月末，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裕农通”APP累计注册用户6.16万户，发放贷款达35.11亿元⑧，切实降低了农户融资门槛、提升了放款效率。

责任层面，重庆市政府牵头联动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引导动员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该行动通过强化政策引导、资源统筹与激励保障，推动资金、项目、人才等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区县和乡镇倾斜。截至2024年底，“万企兴万村”行动累计引导11 178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5 919个村，实施项目13 146个，涌现一大批产业带动性强、乡村特色浓的典型案例⑨，通过多主体协同赋能，有效建立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对象层面，重庆突破过去聚焦传统农户、小微企业基础金融需求的局限，以“精准滴灌”为核心，着力构建不同主体的分型分类精准培育体系，切实帮助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农户、新市民等深度融入现代金融体系。2024年实施《重庆市构建分型分类精准培育机制 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三类，精准识别个体工商户的不同特征和金融需求，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各类扶持资源的有效性。截至2025年8月，金融机构通过“个体贷”“稳岗贷”等专项产品累计发放信贷143亿元，惠及5.2万户个体工商户⑩，有力推动个体经济发展壮大。

上述五个维度相互协同、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重庆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框架，其具象化落地则集中体现在以下特色案例中。

（一）“渔业贷”锚定渔业需求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渔业资源丰富，2023年全市水产品总产量58.9万吨、产值达223亿元⑪，但传统渔业主体因活体资产难评估导致融资困难，中小农户无合规担保物导致抵押物缺乏，再加上粗放的经营模式，产业升级受到严重制约。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背景下，重庆积极响应号召并出台系列政策，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联合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制定《“智慧渔业贷”管理办法》，以收益权质押、资金闭环管理等制度设计，打通渔业融资堵点，设计全国首创金融产品——“智慧渔业贷”。

该产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科技加持，打造数字化经营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构建智慧渔业场景，集成实时查看、视频回溯、多场所巡检、人员预警、船舶预警、运输预警等6大功能⑫，为渔业养殖户打造数字化经营系统，实现智能化养殖。同时，依托数字平台构建“信贷

⑦ 资料来源：《同比增长11.7% 2024年11月末重庆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超6 100亿元》，参见https://cq.ifeng.com/c/8fnUC2VNkIZ。

⑧ 资料来源：《“三农”信贷增力度优服务》，参见http://paper.ce.cn/pc/content/202510/21/content_322308.html。

⑨ 资料来源：《重庆三案例入选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首批优秀案例》，参见https://www.cq.gov.cn/ywdt/jrcq/202504/t20250414_14516675.html。

⑩ 资料来源：《重庆：普惠金融“及时雨”激活个体工商户》，参见https://www.samr.gov.cn:8060/xw/df/art/2025/art_238e829e25734f97b770048c4cadd727.html。

⑪ 资料来源：《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2023年重庆水产品总产量达58.9万吨》，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5XGBshQnjWxiEY4mbUyKmw。

⑫ 资料来源：《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农行重庆市分行创新推出“智慧渔业贷”》，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MqJZuQl61_x3fSVoassAWw。

资金监管+渔业经营周期”双闭环管理模式，既实时追踪贷款资金流向，又对渔业经营状况进行全周期管理，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信贷风险的精准防控。二是质押创新，突破传统抵质押物局限。该产品以渔业经营主体不超过40%的收益权作为质押，解决了中小农户无合规抵押物的核心痛点，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三是产业赋能，推动渔业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该产品以金融为纽带，为中小养殖户、特色水产养殖主体提供专项信贷支持，推动渔业从分散养殖向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升级，助力渔业养殖高质量发展。四是绿色导向，保护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通过智慧渔业管理，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生态合规养殖主体，助力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绿色渔业发展模式，契合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保护要求，承担重庆市生态保护重要责任，推动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从实践成效看，2024年10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向潼南区、秀山县从事鲈鱼、草鱼、武昌鱼等区域名优特色水产养殖的农户发放贷款共计46万元[⑬]。2025年9月，地产水产品产量3 484.52吨，环比增加32.31%，同比增加25.20%[⑭]。这一数据的增长正是前期金融精准赋能水产养殖主体的直接反馈。总体来看，“智慧渔业贷”的推出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践行大食物观，以金融杠杆促进水产供给多元化，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其次，构建“普惠金融+数字金融”融合范式，通过物联网、大数据降低服务成本，提升商业可持续性；最后，形成全国示范效应，为同类地区渔业升级提供可复制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创新性金融解决方案。

（二）“脐橙贷”撬动产业动能

奉节县位于长江三峡库区腹地，当地的脐橙产业是农业支柱产业，年产量达40余万吨，年产值占全县农业产值的40%左右，关系数万农户生计。尽管奉节脐橙产业发展势头向好，但农户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果农需要资金购买先进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合作社需要资金修建基础设施以应对自然灾害；企业则需要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或技术升级。传统的融资渠道往往手续繁琐、门槛较高，难以满足农户和企业需求。针对这些问题，重庆当地金融机构为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推出专属信贷产品——“奉节脐橙贷”。

该产品通过四大有力举措构建金融服务体系。一是构建数字授信，提升服务质效。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摸底脐橙产业情况，依托科技赋能构建农户信用评价模型与信息数据库，通过数字化信贷产品模型让信用贷款落地更精准。同时搭建乡村振兴数字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工作人员入户宣传，将惠农信贷服务下沉到村社。二是打造多元产品，适配多种需求。金融机构为奉节县脐橙产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信贷支持。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奉节县支行指导辖区金融机构推出“脐橙贷”“脐橙产业链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具有纯信用、低利率、审批快等特点，能够精准匹配脐橙种植户、合作社和企业的融资需求。截至2023年10月，奉节县累计投放“脐橙贷”1.15亿元，支持464户脐橙产业主体[⑮]，精准填补脐橙产业中小微主体融资缺口。三是强化绿色引领，协同生态价值。作为全国脐橙单产第一县，奉节立足长江三峡库区腹地的生态区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金融服务，通过信贷支持推动脐橙标准化生态种植，助力奉节发展优质“土特产”品牌，巩固“中国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等荣誉，既保护了库区生态系统，又让果农共享生态产业红利，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四是立足产业链条，推动集群发展。金融机构通过“金融链长制”模式，为脐橙产业提供全链条、全流程的金融服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奉节支行授信3.8亿元，支持脐橙苗圃基地、脐橙果园基地、脐橙交易及饮品加工基地建

⑬ 资料来源：《重庆市农业农村委联合重庆农行创新推出“智慧渔业贷”》，参见https://www.agri.cn/zx/xxlb/zq/202410/t20241014_8678898.htm。

⑭ 资料来源：《重庆市渔业全产业链经济发展指标监测月报（2025年第9期）》，参见https://nyncw.cq.gov.cn/xxgk_161/sczx/202510/t20251011_15070833.html。

⑮ 资料来源：《金融支持特色产业 “脐橙贷”助力奉节脐橙“橙”长》，参见https://news.cqnews.net/1/detail/1163845214002663424/web/content_1163845214002663424.html。

设，助力脐橙产业集群式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奉节支行作为脐橙产业副链长银行，为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支持其扩大生产规模⑯。截至2023年8月末，奉节县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脐橙产业链上2 665户市场主体发放贷款9.03亿元⑯，有效撬动金融资源向小微企业和“三农”倾斜，为脐橙产业向好发展奠定基础。从服务成效看，2024年奉节全县脐橙产量达到50.7万吨，综合产值65亿元，产业覆盖26个乡镇、162个村、30万果农⑰，说明脐橙贷不仅切实缓解了资金问题，更推动脐橙产业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升级的转变，带动果农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产业金融动能。

（三）金融活水浇灌三色产业

重庆石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依托独特的自然条件与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了以辣椒为代表的“红色”调味品产业、以黄连为代表的“黄色”中药材产业和以莼菜为代表的“绿色”果蔬产业为核心的“三色”产业体系。为更好帮助“三色”金融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结合石柱县“三色”产业发展情况，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三色”金融产品，大力支持“三色”产业发展。

围绕产业差异化需求，“三色”金融产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辣椒产业链上授信，助力品牌增值。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石柱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重庆石柱支行”）创新推出“石柱支行辣椒产业链商户贷”专项信贷产品。该产品结合辣椒行业协会会员的经营规模、年限及自身信用情况，能够为会员匹配最高信用额度为200万元的专项信用贷款⑱，为保障椒农增收、助力特色品牌发展提供金融支撑。二是黄连产业信用免押，激活市场活力。经营户无需提供任何抵押物，凭借自身信用和重庆石柱黄水供销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便可匹配额度最高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⑲，有力解决经营户的资金周转需求。截至2024年6月中旬，农行重庆石柱支行共计为黄连市场经营户授信1.24亿元⑳，有力推动黄连市场规模化发展。三是莼菜产业链上注资，加快产销升级。为帮助当地莼菜及其加工产品的出口与内销，农行重庆石柱支行通过清单制批量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莼菜全产业链注入信贷资金约1 500万元，助力莼菜产业从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全程发展㉑。从发展成效来看，2024年辣椒、黄连、莼菜综合产值分别突破7亿、15亿、3.5亿元㉑，带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色”金融产品为县域特色产业强链补链注入金融活水，有效支持了产业链延伸与升级，提升“三色”产业附加值，让农民享受到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四）金融唤醒花田乡山的价值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位于武陵山区腹地，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及良好生态环境，旅游消费潜力大，是重庆市乡村振兴重点乡镇之一。但受限于山区地理条件，花田乡长期以来无法发展机械化、规模化农业，加上产业结构单一、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为帮助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农业银行重庆酉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重庆酉阳支行”）通过多举措扎实助力酉阳县乡村振兴，助力当地打造优质文旅品牌。

农行重庆酉阳支行提供的特色金融服务，呈现三个鲜明特点。一是产业赋能，激活文旅生态。为盘活当地经济、促进当地农旅项目发展，农行重庆酉阳支行将菖蒲花田农旅融合示范建设项目作为服

⑯ 资料来源：《重庆奉节：滴滴“金融水”滋润“橙”长路》，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8AgXGGcsROqc1pe9jf43EQ。

⑰ 资料来源：《奉节脐橙：品牌价值381.7亿元的“黄金果”》，参见https://cqrb.cn/quxiantoutiao/2025-09-12/2411036_pc.html。

⑱ 资料来源：《重庆石柱：金融助力“三色”产业蓬勃发展》，参见https://local.cctv.com/2024/07/02/ARTIJO8Eevsi4sGCXnJ62LKj240702.shtml。

⑲ 资料来源：《金融赋能石柱“三色”产业发展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参见https://app.cqrb.cn/jingji/guancha/2024-07-12/1969162_pc. html。

⑳ 资料来源：《农行重庆市分行金融赋能石柱“三色”产业发展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QuxUDQD5 xyLnjTzIq14_Uw。

㉑ 资料来源：《重庆石柱三色土特产打出国际牌：大山区的产业在开放和争先中逆袭》，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VMb3Fk0aA6goPiwU7_SSBA。

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针对项目建设中的资金缺口问题，分别于2020、2023年两次审批放款，累计提供信贷资金3.11亿元[22]，有效保障了项目顺利实施与复工复产。在金融活水的精准赋能下，项目成功建成观光玻璃栈道、悬崖酒店等特色子项目，吸引大量游客。2025年以来，该县传统村落累计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40万元，为酉阳县打造“美丽重庆先行地”提供了有力支撑[23]。大额信贷资金的注入，不仅重塑了县域经济结构，更通过带动周边民宿、餐饮、农产品加工等业态发展，激活经济发展。二是抵押创新，破解融资难题。为破解当地何家岩村的融资问题，农行重庆酉阳支行以“土地流转经营权”为抵押，为何家岩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贷款50万元用于开垦梯田的治理工作，有效支持贡米产业发展及梯田景观建设[24]。这一创新模式不仅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还为何家岩村贡米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绿色发展，生态经济共荣。农行重庆酉阳支行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实践，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通过信贷产品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例如，捐赠33.75万元帮扶资金，改造花田乡何家岩村村容村貌，帮助构建整洁有序的公共空间；捐助资金，修缮何家岩村山泉饮水工程，让群众喝上“放心水”[24]。一系列生态赋能举措，使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实效。花田乡金融机构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基础，改善村容村貌，盘活生态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使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武陵山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五）重庆经验总结与启示

以上四大特色案例，覆盖库区渔业、山地种植业、产业集群、农文旅融合四大乡村振兴典型产业类型，均基于自身资源禀赋、针对产业痛点、利用金融创新，构建了科技赋能、多元创新、产业增值、绿色可持续的乡村振兴路径，既展现出特色实践亮点，更体现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共性逻辑，提供了可借鉴范式。

第一，科技赋能是效率动力。从渔业的智慧监测、脐橙的信用数据模型，到辣椒产业的线上授信模式，均以数智化破解山区“信息不对称、管理效率低”问题。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使金融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既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又使偏远地区的经营主体享受到高效的普惠金融服务。第二，多元创新是破局关键。针对县域融资难、需求差异大的共性痛点，从渔业养殖与何家岩创新质押方式，到对接需求创新产品矩阵，再到脐橙与莼菜种植创新服务模式，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局限，使农村的资源要素转化为发展资金，使金融活水真正流向县域产业的关键节点。第三，产业赋能是实效核心。金融支持不应局限于放贷，更应聚焦产业链延伸。在渔业生态转型升级、脐橙产业深加工、“三色”产业建基地、农文旅配套业态等过程中，普惠金融的功能正从单一资金支持转向产业生态构建，通过对产业链条的资金注入，推动产业从分散生产向品牌化、集群化转型。第四，绿色发展是长期导向。渔业的水产养殖、脐橙的绿色种植、花田乡的生态环境开发，均紧扣区域生态定位，通过绿色信贷引导产业转型，实现产业增收与生态保护同步，使县域特色产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增值，真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时代发展正对普惠金融提出更高要求：数智化深度赋能、多元化创新赋能、长效化可持续赋能、全产业链融合赋能。基于以上四类实践启示，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要求，本文将聚焦服务深度、

㉒ 数据来源：《“农旅融合”风光好》，参见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2024-06/04/content_401720.html。

㉓ 资料来源：《酉阳：传统村落“活”起来 乡村振兴“旺”起来》，参见https://nyncw.cq.gov.cn/zwxx_161/qxlb/202510/t20251013_15073566.html。

㉔ 资料来源：《农行重庆分行信贷支持巴渝新农村建设》，参见http://cq.people.com.cn/n2/2023/0425/c367643-40392423.html。

协同力度、可持续性、覆盖广度，系统探讨深化赋能的突破路径，为构建适配乡村全面振兴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五、普惠金融深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突破路径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明确金融服务的重点领域和转型方向。普惠金融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如何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金融动力，成为亟待深入研究与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来看，当前普惠金融应向数智化、多元化、绿色化、产业化方向转型，把普惠金融大文章做深做细做实，打破服务壁垒、覆盖全场景需求、守护生态基底、激活产业链动能，深度嵌入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功能定位从“输血”转向“造血”，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效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中国特色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基。

（一）构建数字技术驱动的精准服务体系

金融形态的创新经过信息化、互联网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进入数智化发展阶段，表现出智慧化和高端化特征。依托科技赋能降低交易成本、挖掘信用价值、赋能产业升级，构建适配乡村振兴需求的现代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3]。在产业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基础上，普惠金融数智化能够在驱动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深化普惠金融数智化转型，需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政务、产业、金融等多维数据流通与共享，构建统一的普惠金融数据治理体系，在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通过数据建模、智能分析挖掘长尾群体信用价值，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为精准授信、风险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其次，优化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与场景融合。结合农业、养老、医疗等民生场景，打造“政务+金融”一体化服务网点，提供一站式服务，延伸金融的普惠触角，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灵活调整策略，降低门槛效应，使更多人群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最后，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作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创新为核心，通过技术与模式双轮创新，不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深化发展。

（二）完善多层次机构协同与产品创新

《指导意见》指出“构建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为普惠金融多元化转型提供明确的政策方向和指引。伴随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各地农业产业链呈现特色化、复杂化发展态势，涉农金融主体的需求已从基础信贷向综合化、定制化升级，对普惠金融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与适配性提出更高要求。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需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明确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引导大型金融机构依托数字化平台扩大普惠金融覆盖范围，发挥行业引领作用；支持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及产业优势，创新适配现代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推动种养加一体、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地域特色品牌，助力构建区域现代化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其次，丰富普惠金融产品供给体系。充分遵循“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的原则，紧扣农业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的实际需求，开发多样化、低成本、高效率的普惠金融产品，推动农业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精准匹配，助力农业高质量、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最后，完善政策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加快构建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强化信用文化传播与文明乡风培育，实现“人人有信用、人人讲信用、信用有价值”；健全财政贴息、定向降准等政策激励工具，完善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引入规范化的金融公司治理、契约治理与金融合作制度，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与金融服务可持续性。

（三）推动生态价值与金融价值双向转化

2024年1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促进全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为普惠金融发展指明了绿色导向。普惠金融绿色化转型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将绿色理念融入农业生产与普惠金融，发挥金融的绿色功能，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和质量，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助力构建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格局。首先，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完善绿色信贷体系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加大农村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将生态保护与融资需求结合，引导农业生产主体开展绿色生产、低碳生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生态宜居。其次，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升级“长江绿融通”等区域性绿色金融数字化平台，优化生态资产信息登记、价值评估、交易撮合等功能；加快构建区域性碳汇交易市场及配套服务体系，健全农村林地、湿地、耕地等生态资源的碳汇核算标准与市场化变现机制，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融资能力，为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提供稳定金融支撑。最后，多措并举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农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绿色农业技术、智慧农业装备、循环农业模式等关键领域开展协同攻关；构建“政策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分担”的绿色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农业碳汇质押贷款等针对性金融产品，加大对生态种植、低碳养殖、循环农业等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设立农业绿色转型专项扶持基金，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财政贴息、担保费补贴，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与风险补偿机制；强化金融机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评价，将农业绿色项目支持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引导金融资源持续向农业绿色低碳领域倾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四）构建农业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

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农业产业化纵深推进的背景下，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的结构性障碍仍未完全破除。普惠金融产业化转型作为破解乡村产业融资约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路径，需以“产业链赋能、产业金融融合、风险防控升级”为核心，最终实现金融兴农与农兴金融的动态均衡，推动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深度共生。首先，以链长制重构产业链金融治理生态。深化产业链金融链长制制度创新，构建“链主引领、政府协同、金融赋能”治理体系；依托链主企业整合资源，搭建全链条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信息壁垒；建立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企业互助担保池、保险履约保障相结合的市场化风险共担机制，精准支持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地方经济从资源依赖转向产业驱动，强化产业链韧性与增值能力。其次，构建产业适配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树立产业适应性理念，以乡村产业融合需求为导向，打造“政策—市场—内生”三位一体服务模式；创新信贷、保险、期货等组合型金融产品，适配乡村特色产业与新业态。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搭建线上智能服务平台，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建立金融与产业常态化对接机制，将服务嵌入农业全链条，重点支持高附加值项目，实现金融与产业同频共振。最后，构建多层次产业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立与产业金融创新适配的监管框架，明确新型金融业态监管边界；运用大数据建立动态风险监测系统，依托资本市场、保险与期货工具分散风险，通过信贷担保体系发挥政策兜底作用；推动风险防控纳入乡村治理，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保障普惠金融产业化转型稳健推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 社会主义论坛, 2019(7): 4-6.

[2] 王小华, 杨玉琪, 程露. 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问题与解决方案[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7(6): 41-50.

[3] 温涛, 何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逻辑转换、难点突破与路径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 93-114.

[4] 杜志雄, 高鸣. 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9): 4-18.

[5] 张合成, 李正印. 涉农贷款发展的理论逻辑、结构性问题与实践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3): 4-17.

[6] 王小华, 马小珂, 何茜. 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1): 21-39.

[7] 王小华, 李昕儒, 宋檬, 等.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基于城乡差异视角的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24, 46(2): 45-58.

[8] 杜晓山. 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在2006年中国金融论坛上的讲话[J]. 金融与经济, 2007(2): 33-34+37.

[9] 汪亚楠, 谭卓鸿, 郑乐凯. 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7): 92-112.

[10] 冯兴元, 李铖, 燕翔. 乡村振兴视角下全面推进农信机构为农服务能力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2): 90-104.

[11] 李建军, 彭俞超, 马思超. 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 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20, 55(4): 37-52.

[12] 王义中, 林溪, 李振华, 等.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 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J]. 经济研究, 2024, 59(6): 49-68.

[13] 张龙耀, 李渊, 郜栋玺. 提低扩中: 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J]. 金融研究, 2025(5): 21-38.

[14] Moenninghoff S C, Wieandt A. The future of peer-to-peer finance[J]. Schmalenbach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5: 466-487.

[15] Tobias Berg, Valentin Burg, Ana Gombović, et al. On the rise of fintechs: Credit scoring using digital footprint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0, 33(7): 2845-2897.

[16] 郭峰, 王靖一, 王芳, 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4): 1401-1418.

[17] 许月丽, 孙昭君, 李帅.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 替代抑或互补?——基于农户融资约束放松视角[J]. 财经研究, 2022, 48(6): 34-48.

[18] 星焱. 普惠金融: 一个基本理论框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6(9): 21-37.

[19] 何德旭, 苗文龙. 金融排斥、金融包容与中国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J]. 财贸经济, 2015(3): 5-16.

[20] 周利, 廖婧琳, 张浩.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居民贫困减缓——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证据[J]. 经济科学, 2021(1): 145-157.

[21] Choudhury M S.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context of bangladesh[J].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2014(1): 1-13.

[22] 朱一鸣, 王伟. 普惠金融如何实现精准扶贫?[J]. 财经研究, 2017, 43(10): 43-54.

[23] Peterson K Ozili.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tability[J]. Borsa Istanbul Review, 2018, 18(4): 329-340.

[24] 何茜, 温涛, 王小华. 农村金融服务创新与农户包容性增收——基于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双重视角[J]. 金融监管研究, 2025(8): 40-59.

[25] 王国刚. 从金融功能看融资、普惠和服务“三农”[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3): 2-14.

[26] Park S. Digital capital[M].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7.

[27] Ragnedda M. Conceptualizing digital capital[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18, 35(8): 2366-2375.

[28] 张龙耀, 邢朝辉. 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3): 23-42.

（**责任编辑**：胡英彬）

Deepening Inclusive Finance to Empower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Era Connotation, Practical Logic and Path Innovation

WANG Xiaohua, WANG Xinxiu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leapfrog breakthroughs, delivering remarkable outcomes in serving urban-rural areas and supporting the real economy. At present,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a strong financial country advances in depth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comprehensively deepened, tradition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hardly meet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us,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diversification, green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come inevitable. However, the deepening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still encounters multiple obstacles: first, there exists a cognitive deviation regarding the func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sufficient supply, with some entities neglecting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value of inclusive finance; second, slow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rural credit system restrict risk assessment; third, financial products have poor adaptability to farmers' need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meet differentiated demands; fourth,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lag behind, hindering th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fifth, the imperfect risk-sharing mechanism and lack of collateral weaken financing availability; sixth,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with service gaps in remote area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efforts and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financi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supporting agriculture and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financial co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nnovate green inclusive models to guide resources to rural green industries; build an open digital intelligent financial platform to break information barriers; and improve rur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systems. Only in this way we can inject inexhaustible momentum into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enhancing rural vitality, raising farmers' income, and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by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a strong financial country.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fi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